



CDDC计划2007年出书, 稿件征集正在进行中, 欢迎踊跃投稿...

论明代邸报的传递、发行和印刷

时间: 2002-3-19 22:36:43 来源: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 尹韵公 阅读2060次

我们知道, 邸报是明代社会新闻传播的主要工具和主要方式; 我们还知道, 明代邸报是明朝官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常阅之物, 许多明代史籍记载有关邸报的资料, 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 有一些相当重要、相当关键的问题, 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就是:

1. 在没有现代邮政系统的明代社会, 他的邸报究竟是怎样传递和发行的? 2. 明代邸报是手抄的, 还是雕版印刷的, 或是活版印刷的?

本文试图对这几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以见教于大方。

一、明代邸报的传递和发行

《明会典》卷213曾说: “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门题奏本, 逐一抄写成册, 五日一送内阁, 以备编纂”; 又说: “凡各科行移各衙门, 俱经通政司转行”。根据明朝政府的这一制度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 朱批章奏传下后, 六科或通政司把这些章奏编纂或辑成朝报。在京的各衙门要知道朝报的内容, 或者派自己衙门的书手来六科廊房抄传, 或者由六科派人分发。官员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是多么强烈!

邸报传至保定府这样的地方高级衙门后, 就在官员们之间“轮流传看”; 遇着邸报登了跟某位主管官员有关系的事情, 就“令吏书抄写传送”, 这样保定府辖下的衙门, 也能看到邸报了。邸报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地传递下去的。当时的各级衙门内, 都养着几位抄报书手, 专门抄写行传下来的邸报。如明朝万历年间《宛署杂记》中说道: “前件臣等看得审缓科道官, 因宛大二县供应浩繁, 银两不敷, 将各衙门倚办于二县者, 查出通欲遂行议处, 行据各官回称: 抄报、逻夫、书办、门子工食已经裁革, 无容酒席、帮价、桃符等项, 均属冗费, 相应通行严禁”。

根据明代的文献资料记载, 明代邸报在层层下达转抄传报中, 内容也将相应地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和“贪污”, 即被删节和筛选。因为各级官员在邸报的传抄过程中, 往往只抄传与自己有关系或自己感兴趣的消息报道, 无关的和无兴趣的, 他们就不会抄传。具体怎样, 将视具体情况而定。顾亭林在《三朝纪事阙文序》一文中说过: “臣祖年七十余矣, 足不出户。然犹日夜念庙堂不置。阅邸报辄手录成帙。……自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至崇祯七年九月共三十五帙, 中间失天启二年正月至五年六月, 而其后则臣祖老不能书, 略取邸报标识其要。然吴中报比之京师仅得十五, 亦无全抄, 而臣祖所标识者, 兵火之余, 又十失其一”。顾炎武说, 在吴中看到的邸报, 比京师的邸报, 其内容要少去十分之五, 而且每条消息报道还不是全部抄写。这正是邸报被辗转抄传的结果。怪不得明末清初大学者谈迁为写《国榷》一书, 曾专门进京借读邸报, 因为北京的邸报比传至外地的邸报在内容上要完整得多。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曾用文学的手法详细而生动地描写过邸报在地方上被抄传的过程, 大略如下:

- 晚清的官报
- 抗战中的上海新闻界
- 《良友画报》的启示
- 中国现代新闻传统: 文...
- 清朝末年云南的报纸
- 邓小平与《红星报》
- 《小说月报》终刊之谜
- 绍兴历史上的报纸与报人
- 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
- 风云际会——《大公报...

3. 西门庆的亲家因吃官司，女儿和女婿便回来躲避，西门庆一见，顿时慌了手脚，一面安顿女婿女儿，一面“叫了吴主管来，与了他五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孔目房中，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邸报。上面端的是甚言语：‘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一本，恳乞宸断，及诛误国权奸，以振本兵，以消虏患事。（以下内容从略），西门庆不看万事皆休，看了耳边厢只听飏的一声，魂魄不知往哪里，正是惊损六叶连肝肺，吓坏三毛七孔心”。

——《金瓶梅》第17回

从东京传至阳谷县的邸报决不止是西门庆看到的那一张，只不过别的为西门庆所不感兴趣，而与西门庆有关的消息，他才抄录下来。可以想见，其他邸报抄本也可是样按抄传者的需要摘抄的。这段情节还告诉我们，西门庆为了打听这条命运攸关的消息，不惜动用五两银子去买通衙门的孔目。五两银子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等于明代县衙门书手的两个月工资；按保定府的抄传价格，相当于抄写7本邸报的费用，足见行贿价格之高！《金瓶梅》中还有一段描写：

4. 西门庆正在家打发送节礼，忽荆都监差人拿帖子来问：“宋大巡题本已上京数日，未知旨意下来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门一打听为妙”。这西门庆即差答应节级，拿着五钱银子，往巡按公衙书目打听。果然昨日东京邸报下来，写抄得一纸全报来，与西门庆观看。上面道写甚的——“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一本：循例举劾地方文武官员以励人心，以隆圣治事。（以下内容从略）”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拿着邸报，走到后边，对月娘说：“宋道长本下来了。已是报举你哥升指挥僉事，见任管屯。周府御与荆大人都有奖励，转副参、统制之任。如今快请小厮请他来，对他说声”。……西门庆即令陈经济把全抄写了一本，与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子，送邸报往荆都监、周守御两家报喜去。

——《金瓶梅》第77回

西门庆的这张邸报是从巡按衙门那里弄来的，但可以肯定，巡按衙门里决不止刊有宋乔年题目这张邸报，因为邸报上的其它内容与他西门庆无关，那西门庆抄它作甚？当时人们习惯地觉得：只要是从邸报上抄录下来的内容，即使是抄录了其中一部分，这只有部分内容和邸报，仍然可称为邸报。西门庆不就是这样人为的吗？西门庆不正是继续抄传其中与他及其周围关系者有关的内容，并作为邸报递给吴大舅、荆都监和周守御的吗？

明代邸报每期刊登多少消息？由于没有实物，很难判定。万历邸报和弘光实录钞虽系邸报钞本，但由于后人的抄传和编辑的过程中抹去了期与期之间的痕迹，难以看出全貌。但有一点可以断定，每期邸报刊登的消息决不止一则。顾炎武曾说：“邸报见二疏，深切时事，其捐纳一疏，似必难行，但恐行之而徒为大吏添一矿穴也”。顾炎武看的这期邸报至少有两条消息，其中的一条使他产生了兴趣。我们从一些反映明代邸报的小说和戏剧的情节里，也可以证实每期邸报的消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如：

5. 此时草堂上已点了灯，汪费就将那一本书拿起来一看，是一本朝报，因笑道：“乡里人家看报纸，大奇！大奇！”因问道：“是那里来的？”主人道：“偶然一个京中朋友过此遗下的。”汪费展开一观，只见：

吏部一本，举荐人才之事，户部给事中赵崇礼服满，宜以原官用。

典奇一本，会试宜严考德行，以取真才事。

吏部不本，选官事，准贡监生黄輿，选大兴县儒学训导。俱批：该部知道。

——《自作孽》，见《明清平话小说选》

6. [副净持朝报送上，介]禀老爷，今日科抄有要紧旨意，请老爷过目。[外看报，介]”内阁大学士马一本，为速诛叛党，以靖邪谋事；犯官周鑑、雷演祚，私通潞藩，判迹显然；乞早正法，晓示臣民等语。奉旨：周鑑、雷演祚着督候处决。又，兵部侍郎阮一本，为扑灭社党，廓清皇图事，照得东林老奸，如蝗蔽日；复社小丑，如蝻出田。蝗为现在之炎，捕之欲尽；蝻为将来之患，灭之勿迟。臣编有‘蝗蝻录’，可按籍而收也等语。奉旨：这东林社党，着严行捕获，审拟具奏，该衙门知道。“

——《桃花扇》等30出”归山“

小说《自作孽》中的主人，乃朝廷中的户科给事中赵崇礼，他看的朝报，估计是他京中的朋友送来的，赵本人就是京官，又在朝报诞生地的六科廊房任职，所以他才能看到昨天传递下来的朝报。那本朝报的形势像书籍，里边刊登了三条消息。《桃花扇》剧中的那本朝报上，至少刊登了两条消息。由此再联想到《金瓶梅》上的邸报，那本传到了阳谷县的邸报和那本传到巡按府的邸报，上面刊登的消息也决不可能只有一条，肯定是多条。而西门庆的这种”各取所需式“邸报，虽不完整，但仍然可以视为邸报。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时社会上的各取所需式邸报，其数量相当可观。

明代邸报的传递方式，除了那种官府之间的上而下的层层传递和那种官员转抄于同僚与亲朋好友之间的平行传递的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互相借阅和互相寄看。举例来说：

7. 三年之别，而咫尺未皇晤对，念之邑邑。近者，借阅报知诸君已得谕旨，不止私心庆幸，亦幸楨国庇人，从此厝诸事业，万惟努力，努力。

——《徐光启集》，第609页

8. 邸报附上，经略疏言四路进兵，此法大谬。

——《徐光启集》，第459页

9. 昨自京口渡江，即从六合行，十二日已邸郭外，寓报国寺。……方得邸报，适有人东还，附上，亦私心之喜也。

——《震川先生集》第895页

徐光启和归有光都是朝廷官员，他们是能够看到邸报的，但它们的不曾做官的朋友未必能够看到，为满足朋友们的新闻信息需求，他们便将看过的邸报转寄给朋友们传阅。

在我看来，明代邸报每期刊登的消息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日工作量多少，即皇帝每天能批复多少件章奏，让六科与通政司发抄传报。朝初开国初期，明太祖、明成祖等皇帝，励精图治，日理万机，工作异常勤奋，史称：“自太祖、太宗列圣临朝，每至日鼎食不遑暇，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洪武时期，通政司曾有一次在8天之内，共接收全国各地的题本、奏本达1160件，反映情况为3292起，日平均工作量为阅批章奏145件，处理情况为411件。这样大的工作量连精力过人的朱元璋也不免叫苦不迭。自明英宗登基以后，当时首辅杨荣已英宗幼冲即位，”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英宗既壮，三臣继卒，无人敢言复祖宗之旧者”。到后来，皇帝的早朝工作量，又减为每日七件，陈洪漠在《治世余闻》中说：成化、弘治年间，“通政司奏事，春秋凡七起，盛寒暑则省其二”。天启年间，再减为每天早朝2起，崇祯即位后，又定为4起。当然，早朝只是皇帝每天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作的全部。一般来说，皇帝每天要批答20至30件题本和奏本，如万历皇帝青年和盛年时期，即是如此。假如皇帝批答的章奏中，有一半或一半以下是可以抄法传报的，那就是说，邸报每期刊登的消息

当在10条左右。从明朝的体制看，邸报是能够做到基本每天发行的。每期邸报的字数，按平均每条消息5百字计算（根据万历邸钞和弘光实录钞以及《金瓶梅》上一条消息的全文字数估算）每期邸报的字数最低限度为5千。台湾新闻史学者苏同炳则估计，每期邸报的发行字数“常在七、八千字以上”。

对于京城的朝报来说，它基本上能够保证天天看上邸报。有的论者曾说，明代邸报是5天发一次，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有的地方确实是每5天看一次邸报，但并不等每5天发行一次。按何良俊的说法：“给事中每日在六科廊接本”，朝报当是每天发行。外地官吏阅读最新一期邸报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衙门所在地跟京城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近，周期越短；距离愈远，周期越长。象保定府这样离京城较近的府县尚且5天才能看到一次邸报，那些较远的省份和府县，恐怕要好几个月后才能知道朝廷发生的最新事件。如明代东将总督毛文龙曾说他“于元月初二日，海冻初开，接得去冬十月邸报”，拖欠时间长达五个月之久。万历邸报上有一条来自四川的消息发布于万历三十六年六月，而报道内容说的事情却发生于当年三月。也就是说，四川的信息达于京师，花了三个月时间。反过来推理，京城邸报达于四川，也需要同样或更长的时间。明朝政府曾对京师跟各地传递信息的时间，作过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明会典》的记载写道：

陕西都司，陆路2650里，计43站，限86日；

秦州卫，陆路3320里，计55站，限110日；

岷州卫，陆路4100里，计61站，限120日；

河州卫：陆路4200里，计63站，限126日；

洮州卫，陆路4200里，计63站，限127日；

阶州守御千户所，陆路3700里，计59站，限118日；

文县守御千户所，陆路4240里，计67站，限134日；

西固城，陆路4500里，及61站，限120日；

陕西行都司并甘州后卫，陆路5400里，计87站，限174日；

西宁卫，陆路4570里，计75站，限150日；

庄浪卫：陆路4460里，计70站，限140日；

四川都司，陆路5185里，计86站，限172日；

松藩，陆路5965里，计96站，限192日。

从这个时间表的安排上，我们可以看出，外地省份，尤其是边远省份的官员们要读上一份邸报是多么地困难，一件新近发生的京城新闻到达他们手里时，新闻早就变成隔日黄花了。有时候，外地省份和县府的衙门差人进京奏事，在承差人回程的时候，当局允许他们顺便带回邸报，这样的话，邸报的传递时候就会缩短一些，正如《明会典》所说：“各处抚按镇巡、王府差人赴京奏事者，准赍本衙门府敕书，支禀给，应给双马站船，到彼住起。”不过，这种事情只能时而为之，不能经常干，因为那是犯大忌的，所以不能视为常规。

由于有了邸报的传递和发行，大大调剂和丰富了官员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他们不但

可以借此了解京城大事、要事，而且还能够知道外地其它省份的情况和动态。举例来说：

10. 四川巡按钱桓疏“……近接邸报，见贵州抚臣郭子章疏为镇雄土舍归黔，谨遵明旨。……”

——万历邸钞，第1559页

11. 云南道御史孙承南题：大臣举动乱常，蛊惑人心，大伤风化等事：臣自入任以来，见缙绅间传太仓州王氏女成仙者，其乡人者皆知为妖蛇所侵，独其父锡爵以为仙也，有鄙笑者，有惊骇者。……

——万历邸钞，第119页

12. 江西道掌道福建道御史吴允中等，重地困苦堪怜，藩使骚动虞等事，言：“接邸报，山东按臣马应禔疏，内据城驿抄牌，一称福府承奉门正曹奉令旨，前往山东等处所属府州县”，……

——万历邸抄，第2150页

以上史料10是四川巡抚钱桓对贵州的事情发表政见；11是云南地方官吏对王锡爵之女成仙的社会新闻，感到万分惊讶；12是江西御史对山东问题发表致见。一个在四川，另一个在贵州；一个在云南，另一个在江苏；一个在江西，另一个在山东；它们相互之间靠什么发生了联系？靠信息。信息的载体是什么？是邸报。邸报是官员们了解信息，沟通情况的重要桥梁。

二、明代邸报的印刷和读者群

一谈到明代报纸的印刷问题，新闻史研究工作室往往是不由自主地而又不谋而合地引用明代著名文人顾炎武说过的一段经典性论述：

1. 窃意此番纂述，止可以以邸报为本，粗具草藁，以待后人，如刘煦之《旧唐书》可也。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献，岂无意为增损乎？

——《顾亭林诗文集》卷3，第51页

顾炎武的这段话讲得十分明白，即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以前，邸报都是手抄，之后才开始活字印刷。根据明代文献提供的材料看，这一论述只能是大体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崇祯以前的邸报，层有一些是雕版印刷，其证据如下：

2. 淮抚李三才被论，宪成贻书叶向高、孙丕扬为延誉，御史吴亮刻之邸报钞中。

——《明史·顾宪成传》

3. 昨卧病初起，忽闻其为书传之邸报，刻录盛行。臣异之，以为悬书邸报，自来未有，自今而起，窃以为世道人心何危急如此，将令国是难定，主权下移，当是难以主持公论，日为混淆，天下从此多事矣，云云。

——万历邸钞，第1332页

按史料3中的“传之邸报，刻录盛行，臣异之，以为悬书邸报，自来未有”的说法，雕版印刷的邸报应是在万历年间才开始出现的；按史料2的情况判断，雕版印刷的邸报在当时已是

比较经常地使用了。据我分析，一般邸报仍是手抄的，只有那些被办报人认为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价值的报道，具有特别魅力的报道和能给引起社会轰动的报道，他们才肯付之以雕版印刷，不然的话，时间和经济上都不划算，将导致赔本亏损。

顾炎武说的活版印刷指的是什么活版呢？通常认为活版有三种类型，印泥活字、木活字和金属活字。说木活字印刷邸报，确有其事：

4. 印板之盛，莫盛于今日矣。吾苏特工，其江宁本多不甚工，此有用活字版者。宋毕昇为活字版，用胶泥烧成。今用木刻字，设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则搅活之，复配他页，大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余家有活版苏斜川集十卷，惟字大不划一耳。近日邸报，往往用活版配印，以便屡印屡换，乃出于不得已。即有讹谬，可以情恕也。

——袁恬：《书隐丛说》卷13

这则史料明确地告诉我们，明代邸报真有用活字印刷的，那是用木活字，而不是用泥活字或金属活字印刷的。说明代曾使用过泥活字印刷，只不过是一种推测和想象。在明代的文献中，不但连泥活字印刷报纸的记载只字不见，连泥活字印刷书籍的记载，也是毫无踪影。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感到不解和奇怪：泥活字印刷早在北宋庆历年间就由布衣毕昇发明了，明代社会怎么可能没有享受到这项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成果所带来的爽风和甘霖呢？

不错，毕的活字印刷实在是一项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全新的方向，而且非常富有想象力。仅凭想象就可以想到，比起雕版印刷来，活字印刷不但可以减省经济上的费用，而且还可以大大缩短出书周期。但是，泥活字印刷效果怎样？出书质量怎么样？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活字的那段著名记载中，却没有提过一句。这就诱发我们思索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早在11世纪中期发明了泥活字印刷，经过500年时间之后，却依然没有在明朝得到推广运用呢？难道是明朝人不愿意沐浴新的物质文明所呼唤的阳光雨露吗？不，不是的，也不会的。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里面还存在着难以改进或无法克服的技术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泥活字的原料，按沈括的说法和后人的记录，都称是“胶泥”。胶泥不是科学的名称，现代土壤学认为，胶泥实质上就是粘土，或粘性很强的土壤。粘土分砂质粘土、粉质粘土、轻砂土和重砂土等种类；高岭土也是粘土的一种。前者经过火烧后，变成砖或瓦之类的硬物，后者经过火烧后变成陶瓷品之类的硬物。毕生用的是哪种粘土呢？沈括没有讲明，但后人多数认为，毕生用的泥活字是用高岭土烧质而成。如古代朝鲜人把毕昇的活字版称为“陶活字”，现在朝鲜还保存着220余个陶制大小的活字。当代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也说过：“活字版是毕昇（公元1060年）发明的，他用的是陶瓷”。近人齐如山在《清末京报琐谈》一文中，谈到他参观清末报房时，亲眼看到“所有的字都是用胶泥烧成，字体自然很粗，按物质说，胶泥一经火烧，便成陶器性质”。也有烧成砖瓦状物的活字，如元代大科学家王祜就讲过：“后世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盃，界行内用沥青烧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熟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版的官吏阶层和外地官府的大小官吏阶层以及所有准备入仕和企印”。泥活字的最大优点是原料易取，它的最大缺点是易碎，若成陶瓷状，则上色不易；若成砖瓦状，则表面粗糙，易磨破纸张，而且字划易损和齿残。其实，前人早就看出泥活字的毛病，15世纪朝鲜著名学者金宗直说过：泥活字“率皆烧土而为之，易以残缺，而不能持久”。现代国外科技史专家在谈到泥活字印刷时，也认为：“这项发明却不大被应用，原因似乎是，胶泥活字经烧烤而硬化时会收缩，容易产生不匀称的现象，而又难以用普通的墨汁印刷”。难怪近代学者罗振玉、胡适等人亦对泥活字能否印刷书籍深表怀疑。据说，元代忽必烈大帝的谋士姚枢及其弟子杨古曾用泥活字印刷出版极为少量的书籍，如朱子的《小学》、《近思录》等。清朝时，安徽泾县有一位穷困的教书先生，费了30年心血，“搏土热炉，煎铜削木”，制造出象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10万多个，直到道光甲辰年（公元1844年），这位先生70岁时，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一书。这位老先生显然是想解决泥活字的硬度与韧度问题。

可见泥活字印刷并非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它牵涉到原料、造字、印刷、上色等许多实际应用技术难题。正是因为这些技术上的障碍始终没有得到克服和攻破，所以泥活字一直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和实验阶段的水平上，而始终未能普及。明代社会不但没有泥活字印刷的书籍，而且也没有泥活字印刷的报纸，原因就在于此。

据沈括介绍说，毕昇还试验过用木料作活字，但没有获得成功，毕昇认为：“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低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这就等于给木活字印刷判处了死刑。但偏偏有人不信邪，非要再闯一闯不可，这个就是元代大科学家王祜。他循着毕昇提供的思路，终于成功地创造出了木活字。王祜在安徽旌德县做官时，指导工匠刻制木活字6万余个，费时两年，于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试印他自己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全书6万余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一百部，又快又好，这是迄今为止所知的第一部木活字印刷书籍。我认为，毕昇之所以失败，而王祜之所以成功，很可能是他们各自的选料不同。木料有硬木和软木之分，软木是不宜作木活字的，硬木如枣木、梨木等，才能制成适用的木活字。或许当初毕昇选择的是软木，经试验失败，所以他认为木活字不行；而王祜以硬木入手，就获得了成功。王祜不但创造了木活字，还发明了转轮排字架，即将活字按韵分在轮盘的特定部位，每韵每字都一次编好号码，登录成册。排版时一人从册子上报号码，另一人坐在轮旁转轮取字，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王祜还把木活字制造方法和木活字印刷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有系统地整理和记录，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从此，木活字开始走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印刷史上，王祜是仅次于毕昇的伟大发明家。

泥活字启发了木活字，木活字又启发了锡、铅、通等金属活字。在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铜活字逐渐出现并流行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有无锡的华家、安家，苏州的孙家和南京的张家等，他们用铜活字印卖的书籍流传甚多。近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一书中曾指出：“明时活版书，出于锡山安国家者，流传最广”。然而，铜活字终究没有得到推广和普及，其主要原因大概是后来作为辅助货币的铜钱需要大量原材料，因而铜活字不得不夭折了。剩下来的极少部分也封存于皇宫和官府，世面上也不见。元代和明代人还研制过锡活字和铅活字，试用了一阵子，估计效果都不理想，或者还存在着技术上的难关而一时又克服不了，故都没有流传下来，中途就放而弃之。明人陆深在《金台纪闻》中就说过“毗陵人初用铅活字，视板印尤巧妙，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而分合，又何取焉？兹虽小故，可以观变矣！”明人试印后，反而觉得铅活字印刷还不如手抄质量好。锡活字熔点低，硬度不够，印多了就容易坏，加上金属活字印刷时，需要上等的油墨，而中国古代绝大部分是水墨，造成印刷不过关，字迹模糊和不清楚，正如王祜在《造活字印书法》一文中指出的：“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盃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总之，泥活字和金属活字由于他们自身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和弱点，而不得不让位于木活字。由于我国主要使用烟墨，没有油墨，这就是直到清代还是木刻印刷的一个原因。现代知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曾正确地指出：木活字“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地位，仅次于雕版印刷而压倒其它活字”。当然，木活字也有它的弱点，清朝人包世臣就说过：木活字印书，印了200部，字划就胀大模糊。但木活字的弱点却比泥活字和金属活字要少得多。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使是木活字，不管是在明代，还是在明以后的清代，它的地位和分量始终没有超过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是在清王朝灭亡的前夜。正如近人叶德辉说过的：“活字摆印，固不能如刻书之多，而流传至今四五百年。虫鼠之伤残，兵燹之销毁，愈久而愈稀，比藏书家所以比之如宋槧名钞，争相宝尚”。

综上所述，在明朝社会那样的印刷条件和技术背景之下，报纸的主流仍然是手抄，时而有雕版印刷，木活字印刷只是在明末才渐渐起步，他们三者并村而行于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之中，而泥活字、金属活字没有、也不可能闯入印刷报纸的殿堂。

但是不管怎样，邸报和木活字印刷术相结合的这一事实，无疑地说明了社会对信息需求的日益增强，因而促进了报纸发行范围的扩大，读者人数和发行量也随之而增多。人们或许会因此而提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明代报纸拥有的读者人数究竟有多少？换个角度问，就是：明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明代报纸的读者群状况。根据已掌握的材料，明代报纸的读者群主要分布在京城图入仕的知识分子阶层，还包括武官集团中一部分弃文从武和热衷于政治的将领，但读者群的重点主要是在前者。官员人数和知识分子人数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报纸的抄传量和印刷份数的总和。那么，明代社会的官吏究竟有多少呢？据文献资料记载，明朝开国初期，官吏队伍并不庞大，到明宪宗成化之后，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史称：“历代官职，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期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及见嘉靖初霍兀崖奏稿云：洪武至今，自周一一府论云，禄米增数十倍，子孙日益繁矣，天下文武官逐代增之，较洪武间增十万余员矣”。还有人指出：自嘉靖以后，有许多人通过边功升授、勋贵传请、大臣恩荫各种途径，进入官僚队伍，官员总数又增加数倍。郑晓亦说：“洪武年间，军职二万八千有奇，成化五年，军职八万二前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几倍矣”。又说：道“正得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廩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通过以上概率统计，我们假定：到明代末期，官吏人数已膨胀至10万人左右，这10万名官吏假设其中的百分之二十是邸报的忠实读者，那么邸报在官吏阶层的抄传量就有2万份左右。

我们知道，到明代末期，全国知识分子人数累积达50万人左右。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关心天下，这是明代知识分子的时髦和风尚，因此邸报也就成为他们政治生活中的必读之物。我们假设他们当中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邸报的忠实读者，那就是说，邸报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抄传量和发行量约在1万份左右。恐怕这个数字是低限度推算，估计实际中的数字要超过这一数字。

武官人数虽然远远超过文官人数，大约有15万至20万左右（按明末时期估算），但多数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是邸报的忠实读者。如天启年间和崇祯年间的平辽将军兼总兵毛文龙就常看邸报：

5. 于三月初三日，海冻初开，接得去冬十月邸报，见我皇上宣召廷臣，问对发帑币记注，臣涕泣感叹抱惭。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130页

6. 成梁接得邸报，喜曰：“好了，仇人已去了”。

——《万历邸钞》，第564页

李成梁是明朝著名将领，毛文龙是弃文从武的秀才将领，象他们这样的人在武官集团中，也有一些，但人数不会太多，估计也就在百分之十左右。假若这个概述能够成立的话，那整个无关集团中就有1万人左右的邸报读者。归纳以上，全国邸报的抄传量和发行量为13万份左右。按当时全国人口1亿3千万计算，平均每1000人左右就有一份邸报。这个低限度的统计数字表明，按当时的标准衡量，明代社会的新闻传播事业已是相当发达和繁盛。

走笔至此，我们可以从以上的文字中得出以下有价值的观点：1. 明代邸报的传递和发行既有中央部门通过官方驿站自上而下地传送到各级地方衙门的垂直方式，还有私人朋友之间的借阅传阅方式。2. 在这种层层下达的抄传过程中，邸报的内容因衙门或官吏的需要不同而被“贪污”和减少，即各取所需式的邸报，是明代邸报的各个重要特点。3. 明代邸报基本上是每天抄传，每期邸报刊登的消息在1条左右，每期字数至少在5000以上。4. 外地官吏阅读到最近一期邸报的时间，取决于官吏本身供职的衙门所在地跟京城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近，周期越短，距离愈远，周期愈长。5. 明代邸报主要是手抄，但也有雕版印刷，崇祯11年后开始出现活字版印刷邸报；但这里的活字版，指的是木活字，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泥活字或金属活字。（原载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 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专栏: 尹韵公

- 尹韵公: 展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魅力 (2004-12-1)
- 谁在对谁行为? ——跨文化传播的思考 (2004-10-25)
-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闻传播学研究——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 ... (2003-11-16)
- 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先秦至唐宋 (2002-1-19)
- 尹韵公简介 (2002-3-19)

[>>更多](#)

[-] [论明代邸报的传递、发行和印刷](#)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 ◆ [联系CDDC](#) ◆ [投稿信箱](#) ◆ [会员注册](#) ◆ [版权声明](#) ◆ [隐私条款](#) ◆ [网站律师](#) ◆ [CDDC服务](#) ◆ [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 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 [MSC Status Organization](#) ◆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 版权所有 ◆ 不得转载 ◆ 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 如有违反, 追究法律责任.